

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以教外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考察

杨卫华

基督教社会主义是西方基督徒为调和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而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在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但最早在中国介绍的却不是基督徒，而是出现在早期教外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引介中。其中日本是重要的中转站，早期的介绍多经日文作品翻译而来，后来才慢慢从美国、英国及德国的作品中直接翻译，并引起中国马列主义者的注意。但它只是社会主义介绍的附带品，而非教外人士认同其说，是为比较研究起见，作为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对比的资源，让人更清楚理解社会主义的源流。

关键词：基督教社会主义 教外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

作者 杨卫华，1982 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基督教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其基本的理论倾向是致力于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调和，实现基督教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的基督化。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学术界聚焦的热点，但对社会主义派别的关注很显然是不平衡的，在各种大小著作中基本上看不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身影。当然，这种情势除与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两大思想阵营中的边缘化位置有关以外，也与其本身在近代中西历史中的影响大小相关。但其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主义流派，确曾进入中国教俗两界的言说范围，特别是在基督教界有较广泛的影响。刘家峰教授曾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①一文中对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中国基督教会内部的传播情况有非常好的讨论，但该思潮并非仅仅局限在基督教内部，而是曾引起世俗知识界的广泛注意，本文即以教外知识分子为中心，探讨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世俗知识界的流传与渊源，这有利于更加完整的认知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一、日本中转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尽管主体上是一种宗教运动，但其第一次现身中国却并非出于基督徒之手，而是出现在早期教外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引介中。而日本成为最早的来源，不管是早期日译社会主义论著，还是 1930 年前后对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贺川丰彦和石川三四郎相关著述的翻译，都成为国人接触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重要渠道。有学者已看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日本社会主

^{*}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3PJC065），另受到上海市教委高校一流学科（B 类）上海大学世界史项目资助。

^① 刘家峰、刘莉：《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宗教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

义运动中,基督徒的广泛参与。陶慕廉(G. O. Totten)曾指出基督教是早期日本社会主义队伍扩大的重要因素,并明确提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团体在其中的参与^①。伯纳尔(M. Bernal)也看到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基督教角色,且很多人都持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观点^②。正是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为国人接触基督教社会主义提供了契机。

在中国早期翻译的几本社会主义译著中,作者多是日本人兼基督徒。如村井知至,基督徒,曾任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其《社会主义》在光绪壬寅(1902)三月由罗大维翻译出版,专列一章讨论社会主义与基督教,认为二者并非仇敌,“初代基督教则与此主义正大相似,匪唯相似,且全合其精神思想,殆有异名同体之观焉”,他认为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相似:理想与目的为一;传道之热心亦相似;同遭社会之迫害;传播之速亦相似;同为世界的思想;同对民溅洒同情之泪;同富于兄弟相爱之精神,故其“以古代基督教代表近时之社会主义,以今时社会主义代表古代之基督教。两两互勘,无可疑者”^③。显然企图为其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寻求某种理论和谐。同年三月周子高翻译西川光次郎《社会党》出版,该书在白耳义(比利时)社会党篇提到“有哥灵斯者,始著书说基督教之社会主义”,又在丹麦社会党篇提到其国内“有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者也谈到1800年前后从英法德移居美国的宗教徒所建立的共产村,达200余处,成为美社会党的渊源之一^④。这是笔者见到的最早明确提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名词的文字,但止于提及,无多论述。

真正较详细介绍的是曾赴日的赵必振翻译、1902年首版(后多次再版)的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⑤,该书以一章介绍基督教社会主义,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本来之素愿,与基督之教义同其趣”,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兴起正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一种反动,“自由主义之学说,极其旺盛,于经济社会,凡任放之行为,与富者之贪婪,一任自然之趋势,于是社会组织之弊害渐显,而不公平不平等之显像,益益弥漫”,基督教社会主义之兴起即是想以伦理介乎其间,以剔除社会的弊害。作者接着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英法德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关于英国,介绍了1848年莫利斯(F. D. Maurice)等的活动,认为其虽只获得一时之成功,但效果不小,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也获得不少名誉。对1877年后以基督教改革社会的团体与政党在改善劳动者生活处境及立法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有所肯定。对于法国,作者提到拉耶渥以基督教解释社会问题,为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开端。并认为“法国之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与英美诸国之基督教社会主义相比,大异其趣,或信托于宗教教义,或纯然为社会主义的党羽。然法国之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其势力不免微弱”。德则主要提到其分新旧教两种,新教的势力较旧教的社会党势力为微弱,并详细介绍了德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活动及其纲领。作者认为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起步较晚,布利斯(W. D. P. Bliss)等首倡,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论,则为无数知名学者所述,作者比较详细介绍了其纲领。

更多将基督教社会主义带到中国的是石川三四郎和贺川丰彦。前者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基督徒,以无政府主义闻名,但其曾经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其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史》等,颇有影响。1929年李博将其《基督教社会主义》翻译出版,1930年出版的《社会运动史》则用一章介绍基督教社会主义,两书内容差不多,只是详略

① 陶慕廉:《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赵晨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25页。

② 详见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4章《一九〇六以前日本的社会主义》,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 村井知至:《社会主义》,罗大维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26—29页。

④ 西川光次郎:《社会党》,周子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5、9、25页。

⑤ 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时代书局,1928年,第3编第5章。该书1902年由上海广智书局首版,国家图书馆藏其首版,笔者没能看到,仅据其目录得知。

有异。两书都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名词为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金斯利 (Charles Kingsley)、莫利斯等首创,从此成为与非社会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奋斗的标签,但以基督教的精神而作社会主义运动的是圣西门。作者在该书中基本把基督教几千年历史中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物与活动挖掘出来,其赞同《社会主义史》作者克卡朴等人的观点,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不相冲突且关系密切。两书末尾都引用了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布利斯的名言:“基督教社会主义是把基督教的道理用于社会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个人的基督教。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最初所应做的事,当然是个人的接受基督。基督教社会主义并不把悔改、信仰、洗礼、圣餐等个人的精神的生活,也取而代之。基督教的救济不能专靠组织或境遇的力量一举来实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固然是由于个人的服从基督而起,但是在现代,却不能单以个人的服从为一切的服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的法则,可由旧约中看得出来。基督是为成全这法则而来的……个人主义,忘了法律,而制度主义忘了人情。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通乎人情,以完成其社会法”,作者认为从中能窥探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信仰。^①

在中国影响更大的是日本著名布道家及社会改良家贺川丰彦,其曾多次来华,自称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曾自述到“最初我是一个抱社会主义的人,不是物质的是灵性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要改造社会必须有社会的原则,那就是社会主义。我是一个基督徒社会主义者,虽然,在日本,他们很不喜欢这名称的”^②。鉴于其影响力,其论著引起了中国教外知识分子的注意。时在日本求学的阮有秋(后加入中共)将其《基督教社会主义论》翻译,于1928年出版,显然不带有宗教目的。该书讨论的是广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贺川表明其基督教社会主义并不是如英国等特殊时代特殊地方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基督教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无论那一个时代事实上都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生活,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光荣的历史自身便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之本质。基督教之运动,根本上已不是个人主义的运动,这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爱之运动,我们不能说他单是一种经济的运动,他同时是生命之运动或到自由之运动。换言之,基督教从开始便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以这种认识为框架,该书将基督教历史中的社会主义挖掘出来。贺川式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一种以基督爱为基础的渐进的社会改良运动,他在“社会革命乎?社会进化乎?”一节认为“耶稣决未曾叫我们妥协,他说我们为了主义,有时候竟不得不舍弃家庭,舍弃民族。但是他却不以为理想的社会组织是可以一瞬间构成的”,天国是渐渐成长进步的,“耶稣始终主张社会运动应以道德的内部改造为基础,并且相信另有超越的上帝之力来参加这种改造的工作”^③。

尽管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充斥浓厚的基督教背景,但其本身也是分裂的,并非所有人都拥护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关系亲密的观点,幸德秋水对基督教的批判广为人知,我们也可从下面两人的评判中略知一二。《东方杂志》曾翻译北吟吉原《社会主义之检讨》,作者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仗人道正义之剑,斩断以财货为正当权利之欲情”,批判少数富裕多数贫穷悖乎人道正义,富者应分利于多数人。作者评论到“自宗教家之地位观之,此种观察,固不可谓不当”,但要使富人成为圣人、平等报酬是不可能的,也有碍产业发展与进步,除非人人都是圣人,社会主义才能实现。^④这可作为非社会主义人士的观点,而平林初之辅则更多以科学社会主义对之加以称量。他在其

① 石川三四郎:《基督教社会主义》,李博译,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第48页;石川三四郎:《社会运动史》,北平:青春书店,1930年。

② 《贺川丰彦生平事业的自述》,《工业改造》第15期,1927年12月,第11页。

③ 贺川丰彦:《基督教社会主义论》,阮有秋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3月,第2—3、45—46页。

④ 北吟吉原:《社会主义之检讨》(续),君实译,《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第104—105页。

《近代社会思想史》中简单介绍了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莫利斯等人揭露自由竞争制度的弊端，攻击拥护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根本在将基督教运用到社会改造上，这是一种精神的博爱主义，“与将基础放在社会进化必然性上的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关系很远的东西，他的不能获得长久的寿命，实在是当然的”^①。

二、20 世纪初革命派、立宪派、无政府主义者的介绍

除早期日译社会主义论著中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介绍外，其也开始出现在国人自身的文字中，早期的革命派、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都有触摸到基督教社会主义。据广泛考察早期的教内外报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介绍首先出现在革命派的报纸中，1906 年 5 月，《民报》在翻译日本巡耕社介绍欧美社会革命运动的文字中触及到欧洲的基督教社会党，该文在介绍社会主义时提到“以宗教精神为重者，基督教徒社会党也。此党以基督教徒占多数于议院为达目的。盖温和派也有不问议院占多数否”，认为“基督教徒社会党”为社会主义的一派^②，语多不详，难以确定其讨论的是哪国或哪教（新、旧）的社会主义。明确出现“基督教社会主义”名词的是革命派廖仲恺 1906 年 9 月发表在《民报》上的《社会主义史大纲》，该文正是译自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布利斯的《社会主义手册》（*A Hand Book of Socialism*）之一节，廖将作者翻译成柏律，称其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之说有异，之所以翻译，乃为比较研究起见。该文主要集中在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作者称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者蓝孟耐（Lamennais）“开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第一之著述”，而约翰（John Boll）则可称为“中世纪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也提到了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及其所主张说教协助、组合产业之协助同志会等^③。其后又翻译了该书另一节《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民报》第 9 号发表，从中可见布利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④廖又在翻译日本久津见蕨村的《欧美之无政府主义》时的译者识中提到博律氏属于基督教社会主义，“此派为社会主义中最温和者”^⑤。孙中山也曾于 1912 年 10 月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说、介绍社会主义流派时提到了英国的宗教社会主义，认为“在英、德，又有所谓宗教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其以宗教、世界而范围社会主义，皆未适当”^⑥。

20 世纪初立宪派也颇注意社会主义，在日本研究社会主义的吴仲遥，首先触碰到基督教社会主义。其于光绪三十二（1906）九月在《新民丛报》发表《社会主义论》，提到“耶稣教的社会主义”，“以耶稣教之圣书为论本”，与马克思主义并列为狭义的社会主义中的一派，作者也介绍了日本学者田岛锦治的社会主义分类法，其中就有 *Christian Socialism*。但作者认为“广征各国之学说，详稽我国之情实，觉狭义的社会主义实万不可行，而广义的社会主义又必不可少”。^⑦从作者文中可见其倾向于社会改良主义，对一个非基督徒而言，不大可能接受基督教社会主义。

其后，刘师培在日本办《天义报》，并和张继等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和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打成一片，为无政府主义所迷，在这过程中接触到基督教社会主义。1907 年 9 月刘在《天义报》发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提到了古代及中世纪基督教中的共产

① 平林初之辅：《近代社会思想史》，许亦非译，上海：中华书局 1931 初版，1940 年再版，第 48 页。

② 巡耕稿：《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社员译，《民报》第 4 号，1906 年 5 月，第 3 页。

③ 博律：《社会主义史大纲》，渊实译，《民报》第 7 号，1906 年 9 月，第 101—106 页。

④ 博律：《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渊实译，《民报》第 8 号，1906 年 9 月，第 145—150 页。

⑤ 久津见蕨村：《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渊实译，《民报》第 8 号，1906 年 10 月，第 132 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08 页。

⑦ 仲遥：《社会主义论》，《新民丛报》第 4 卷第 17 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第 37—41 页。

意识,并将以宗教为根据的社会主义作为近世社会主义三派之一。^①而无独有偶,他也翻译了布利斯《社会主义手册》中的部分,发表在1908年2月出版的《天义报》上,译文内容和廖译相差无几,刘在译者识中将作者名译为比利斯,认为其学说以基督教为根据,与马克思主义及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多有不同,“以为社会主义,多出于基督教徒”。翻译此文,并非以其评断为可取,而是因为该文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及流派的提要,叙说简明,足为不明社会主义源流的国人所参考。^②

需要注意的是,除早期日译外,革命派的《民报》、无政府主义的《天义报》、立宪派的《新民丛报》都是在日本出版的,他们所能取材的资源也基本上来自日本或从日本获得的西文作品,像吴仲遥文所列的参考书基本上为日人著译,刘师培也应该是在日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期间接触到《社会主义手册》,廖仲恺类似。所以早期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接触基本是由日本中转而来。

三、源于欧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前节已述日本在基督教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其源头毕竟是在西方,日本相关著述也基本是受欧美影响。伯纳尔已看到美国在日本社会主义(特别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成长中扮演的角色,多人留学美国带回社会主义,而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伊利(R. T. Ely, 1854—1943)、布利斯的论著《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手册》等,在日本都有深远的影响^③。曾和留日中国人打得火热的日共创始人片山潜早年就是在美留学期间读了伊利著作成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片山也是个基督徒。^④伊、布二人在中国教俗两界确实是经常提到的名字。

在20世纪初与日本短暂的亲密之后,国人的眼光开始转向欧美,当然,其中也还有日本的影响。前节已谈到刘师培、廖仲恺经由日本而接触到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者布利斯的《社会主义手册》,除此之外,布氏著作翻译的未及见。较多的是伊利的作品,其中讨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Soc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1894)和《近世社会主义》,两书都多次再版。伊利是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早期领导。1922年何飞雄译《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出版,该书较为简略地介绍英美德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及著作刊物,作者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暧昧空泛,具有不同的意义,有时主张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相加,基督教自身达于社会主义;有时提倡社会团结及慷慨同情社会中之最不幸者,有时是指反对马克思之唯物主义而论,有时则指不违背基督教的伦理,反对暴力手段,最核心的议题是如何以博爱主义用于世界产业。所以,“吾以为基督教社会主义之名称,不若废止之之为愈也”。但尽管如此,“此派之著述,研究社会主义者,亦当注意之,盖借此助可窥见基督教会之一部分,对于现今社会问题及社会主义之思想为何如也”^⑤。

① 刘师培:《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769页。

② 刘师培:《社会主义史大纲译者附识》,《刘申叔遗书补遗》,第969页。

③ 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页。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周子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28页)也介绍了伊利的《美国之劳动运动》和《近世德法之社会主义》两书。

④ 李威周:《日共创始人——片山潜》,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页。

⑤ 伊利(R. T. Ely):《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何飞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一编87—88、104页。伊利另一本翻译成为中文的是其 *Outlines of Economics*, 两个版本《经济学概论》(熊崇熙、章勤士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和《经济学大纲》(郭大力译,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

1923年留日的黄尊三翻译了 *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 in Modern Times* (1883), 名《近世社会主义论》, 该书以三章讨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作者认为基督教圣书中包含有社会主义, 且基督教主张完全平等, 故“谓基督为极端之共产主义者, 亦无不可”, 作者接着介绍了法国(介绍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鼻祖拿麦来 Lamennais)、英国(对其批驳自由竞争的自利制度、为贫民谋幸福及在生产组合、慈善、劳动立法等方面的贡献给与肯定)和日耳曼(新旧两派及其主张)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作者最后对基督教起而改良社会感到欣慰, 教会应与政治经济学家合力共图改良社会政治, 提高劳动者地位, 避免资本主义的专横, 才能免过激革命之破裂。^① 伊利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骁将, 且曾著 *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1889), 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评判确较为到位, 从中也可可见其改良主义取向。

其次是对英国社会主义论著的翻译。在苏俄革命引起的社会主义热情中, 李季所译的《社会主义史》诞生, 毛泽东明言这是其所看第一本社会主义论著。该书较为简略地讨论了英国的“耶稣教社会主义”, 介绍了其代表人物金斯利、莫利斯、卢洛德(John. Ludlow)等, 他们揭露自由竞争制度的弊端, 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耶稣教在社会改良方面的运用罢了。主张以伦理和精神维系社会, 提倡协作思想, 发起联合会, 对社会颇有裨益。和协作运动联在一起, 生产协作没什么成绩, 但协作的分配确有较大成效。作者认为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从感情和对现实社会的批评上, 都是从社会主义着眼的, 但在建设上完全失败了, 他们补救资本主义流弊所用的方法, 不过是将欧文的乌托邦稍作修改罢了。他们想把劳动者变为小资本家, 使劳动和资本得以调和, 协作生产, 平均分配, 但效果不佳, 又组织缺乏, 后因种种原因消失了^②。作者另一经辟司(Edward R. Pease)修订出版的书《社会主义初步》于1923年翻译成中文, 书中也有对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介绍, 内容不出上书。^③ 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卫布(S. Webb)夫妇所著的《英国工会运动史》也对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有所介绍。^④

另一对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给与较多笔墨的是1929年翻译的英国工党政治家本森(George Benson)所著的《英国社会主义史》, 该书以一章讨论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 作者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是“非历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后形态”, “他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他在社会主义思想上有所建树或有所补增, 无宁说是因为有几个与他有关系的人物”, 作者提到莫利斯是领袖和鼓吹者, 金斯利、卢洛德等则是随从者。“基督教社会主义根本上是一种宗教运动, 这种运动鼓动力就是只有使日常生活与基督教伦理相和才可以消灭社会罪恶的信仰。因此, 竞争和自私心必要打破而代之以合作和友爱。上帝的秩序必要维持”。他们认为旧日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他们抛弃了上帝的计划, 所以不但基督徒要社会化, 社会主义者也要基督教化。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如果分离, 二者都将陷入无救的地位。他们是对宪章运动一种反抗。他们最大的成绩是由个人而不是团体做出来的, 使合作运动取得法律地位, 这是其对合作运动的最大功绩, 并取得了工业简约社案的获取。他们自以为与欧文相反, 实际上与他无大区别。他们以为达到目的途径就是以道德相尚的生产者合作团体, 政治无补于事。他们没有欧文的创见, 计划狭隘而不见得实际。他们与欧文的区别是欧文在人类道德化的工作中侧重社会组织工作, 而他们侧重以道德勉励个人以求得社会组织的改变。二者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当然, 欧文想排挤宗教而他们则以宗教为

① 伊黎:《近世社会主义论》, 黄尊三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 第185、196页。因日本河上清已经在1919年翻译了本书, 并且日译本也将书名译为《近世社会主义论》, 所以不清楚黄是原译还是转译, 转译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些。日译由河上清译述, 田岛锦治补阅, 东京:法曹阁书院, 1919年。

② 克卡朴:《社会主义史》, 李季译, 新青年社, 1920年, 第81—82、162—163页。

③ Thomas Kirkup:《社会主义初步》, 孙百刚译, 上海:中华书局, 1923年, 第40页。

④ 卫布:《英国工会运动史》, 陈健民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 第155—156页。

基石。^①

一些翻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论著也留下了关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记录。比亚 (Max Beer) 认为 1848 年的新宪章运动对金斯利和莫利斯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者留下的遗产就是协作的观念。^② 较深入讨论的是桑巴特 (W. Sombart), 在其《德意志社会主义》重点探讨了德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神圣和世俗两类, “神圣的社会主义” 又有基督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新教社会主义和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派别分野。作者并不赞成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观点, 认为 “基督 (新教、宗教) 社会主义并非社会主义之一种, 而实为社会主义之旁门歧途。它或是误解了基督教, 或是误解了社会主义, 或是两者都误解了, 并且多半是被利用为一种可以做不公正事的帐幕, 其下隐藏着一定的极尘俗的追求”, 但作者肯定天主教的社会主义是确实存在的, 是 “神圣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一种。它是神圣社会主义, 因为天主教的理论要求一种社会主义的共同而其所趋向的秩序则以上帝为原始”, 作者较为肯定后者。^③

四、民国本土话语中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进入民国, 除翻译中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外, 一些国人的自著中也开始出现基督教社会主义。当然, 也多取材于海外资源。胡适在 1925 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除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 基督教都是资本主义者。^④ 清华大学经济学家留美的刘大钧 1918 年发表《社会主义》, 涉及宗教派的社会主义, 认为其分罗马教和新教两派, 前者行于德法奥比, 后者行于英美法德瑞。在法为激进派, 在德为渐进派, 各国许多的团体都直接或间接接受其影响。并指出其本意在 “排斥社会主义”, 派中各说也极不一致。只是对英国放任派经济学说皆极反对, 认为听任个人独行而能至治, 与上帝救世之说相违。而社会主义谓改良社会, 个人则无罪, 又与祈祷忏悔之说相反, 其宗旨即救世之道在明道。^⑤ 尽管介绍仅止于纲要, 但却能点出其核心理念及发展态势。孙卓章也在其《社会主义史》中指出基督教社会主义分天主教和耶稣教两派, 前者盛行于法德, 后者注重生产合作组织, 流行于英美德法。但作者又认为 “基督教社会主义, 本不甚重要, 而派别又复杂”, 其 “顺从自然法则, 但他又拒绝正宗派经济学的自由主义, 他常依附国家, 但他又反对国家主义, 他既不合于马克思主义, 亦不合于无政府主义, 惟邻近于国家社会主义”^⑥。唐卢锋《社会主义浅说》也谈到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 认为其与其他社会主义不同, “不用立法或革命的手段, 想用教育的手段, 求人心道德的进步, 由内部的改造以达到外部的改造”, 但太偏重理想, 后来渐渐政治化了。^⑦ 而华超的《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介绍与评价则完全出自伊利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⑧。总之, 民国士人已注意到基督教社会主义, 但介绍多因袭外来论著, 且不认为其为重要。

基督教社会主义也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 1919 年 4 月李大钊发表《混充牌号》, 认为世间一旦有一主义流行, 就有混充他牌号的纷纷四起, “‘社会主义’流行, 就有‘皇室中心社会

① George Benson:《英国社会主义史》, 汤浩译, 上海: 明智书局, 1929 年, 第 147—154 页。

② 比亚:《社会斗争通史》第 4 卷, 叶启芳 (基督徒) 译,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47 年, 第 184—185 页。

③ W. Sombart:《德意志社会主义》, 杨树人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初版, 第 91、92、96 页。

④ 胡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集》,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359 页。

⑤ 刘大钧:《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11 号, 1918 年 11 月, 第 197 页。

⑥ 孙卓章:《社会主义史》,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年二版 (1924 年初版), 第 96 页。

⑦ 唐卢锋:《社会主义浅说》, 上海: 中央图书馆, 1927 年, 第 74 页。

⑧ 华超:《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年, 第 16—18 页。

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出现”^①。很显然，李视基督教社会主义为混充牌号。1920 年对新村主义感兴趣的李又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详细介绍美国基督教共产村（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笔者），视其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② 1923—1924 年间，李在北大讲授社会主义，专列一节讲基督教社会主义，主要介绍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及其代表人物金斯利、莫利斯和卢洛德，而对另一个受基督教社会主义影响的艺术家 John Ruski（积极参与金斯利等的活动）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李介绍基督教社会主义拟以基督教的教义、主张应用作社会主义，以改良社会。并认为“此皆实际之运动，非空言者可比。彼相信论（伦）理上、精神上之努力，可以改造社会。由马克思派之眼光观之，是不认许，唯物史观与宗教是矛盾者，然英国于此种运动，对社会上颇有影响，不能一概抹杀”^③。从中可见李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有一定的了解与重视，尽管其以马克思主义为秤杆而对之不予认可，但并没有完全加以否定。而与李并称“北李南杨”的广东马克思主义者杨匏安也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时著有基督教社会主义专文，1919 年 12 月杨发表《基督教〔社会主义〕》，认为它取广义社会主义，以博爱精神，图改良现世社会，故称基督教社会改良主义，“取社会主义之精神，而不取其手段也。为构成而不为破坏；为指导而不为政策；为理论而不为实验；故与其称社会主义，不若谓为社会改良主义也”。分新旧教两派，其开山祖为莫礼士（即 F. D. Maurice），其名言为“基督徒之不奉社会主义者，不能为真教徒；而真正之社会主义者，又非奉基督教不可；盖社会主义，不外基督教历史发展之结果而已”。^④ 杨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把握颇到位，且并未持激烈反对，但其显然不会认同这种改良性质的主义。

另一个提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是恽代英，1923 年 12 月其发表《社会主义与劳动运动》，对它有所评判，他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不欲以革命和立法手段达其目的，而专以教育为手段，这与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必须个人完成，无政府主义乃能实现，一样落于空想之弊。要靠教育靠精神生活之改造来改造社会，只看人类四五千年所进行的教育，或劝化功夫有何成效，便可憬然自悟了”，所以“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完全应受排斥。因为那是无益的空话”^⑤。早年曾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恽，这时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对基督教社会主义基本是否定的。

熊得山也是一个介绍过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早年加入中共，1932 年被捕，1933 年出狱后脱党。在其 1929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中以一章介绍基督教社会主义，其介绍与评价充斥着非常浓厚的马恩印记，他在谈到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兴起时认为宪章运动失败后，英国工人阶级 30 年不谈政治，使不干预政治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乘机而起。而对其没落，则因 19 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地位趋于衰弱，政治上的劳工运动崛起，自然没有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位置。他在详细介绍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核心主张后，认为耶稣本身是消极的人格和和平的天使，其后基督教和罗马帝国合流，后又成为封建领主麻醉农奴的工具，到近世又成为榨取殖民地的工具，是民众的鸦片。基督教社会主义宣传人类同胞的爱和合作运动，使被压迫者的视线疏离于政治，而集中于组织经济，以便支配者能为所欲为。在劳动者日益趋向

① 李大钊：《混充牌号》，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28 页。

② 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52 页。

③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228—229 页。

④ 杨匏安：《基督教〔社会主义〕》，《杨匏安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42 页。

⑤ 恽代英：《社会主义与劳动运动（读书录）》，载《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14—415 页。

社会主义（政治上）的年代，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各国都难以有大的势力。^①马克思主义者因其主义对宗教的负面印象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绝然排拒倾向使其不可能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有所好感。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共产党宣言》就有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评论，如1920年8月首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陈译道：基督教最易加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它也反对私有财产、国家等，但“基督教社会主义，只是僧侣清理贵族心火的圣水”^②。陈译成为不少国人接触共产主义的启蒙书，影响巨大，且他种《共产党宣言》翻译版本繁多，其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批评应该广为人知。

五、结 语

必须说明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及介绍以教外的社会主义引介为背景，它只是社会主义介绍的附带品，而并非教外士人认同其说，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非常有限，它不可能在教外士人中找到生存的土壤，顶多也就是如廖仲恺、刘师培所说的比较研究起见，作为一种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对比资源，让人更清楚理解社会主义的源流。这也就是蔡元培在为沈嗣庄《社会主义新史》作序时所言：“吾国译述西洋社会主义史者，已有多种，然对于宗教家之运动，多不致详。今读沈嗣庄先生之《社会主义新史》，乃详人所略，侧重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关系，使读者公认此种运动，为人类普遍的要求，而绝非一学派之所杜撰，则其对于社会主义之研求，将益增兴趣。故吾谓沈先生此书，绝非以宣传基督教为目的，而实在表彰社会主义运动全部之事实，使不致有偏枯之感焉”^③。当然，这种说法可能不会为著者身为基督徒的沈嗣庄所认同。实际上，前面提到的福井准造（非基督徒）在其论述基督教社会主义动机时也说“今因论述一切之社会主义，顺序一言及之”，基督教徒认为偏重物质的观念，而怠慢精神的修养，绝非救助社会人类之途。这种观念“果为宗教家社会问题适当之解释与否，暂为未定之问题。不过述序其社会主义讲究之顺序与其运动之大要，为译社会主义者研究焉”^④。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熊得山：《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3月，第45—51页。

②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文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③ 蔡元培：《〈社会主义新史〉序》，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48页。

④ 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时代书局，1928年，第251、245—246页。